

流失文物回归路

■本报记者 王俊宁

尽管不少媒体已经报道,今年9月即将回归中国的7根圆明园石柱,会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至今也没有收到北大校方关于此事任何确切消息。”

校方的“谨慎”也不无道理。原本只是一些海外文物回归,因为“商人黄怒波”“圆明园”“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等元素而引发了许多争议。

黄怒波绝不会料到,自己的一份好心,会在国内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圆明园”是引爆点

事情起源于《纽约时报》2月9日的一篇报道,报道称,挪威 KODE 博物馆与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达成协议,来自圆明园的七根汉白玉柱基将于今年秋季重归中国,并安置在黄怒波的母校——北京大学。

“其实,这件事情引发如此大的关注,首先就是因为‘圆明园’这三个字。”宋向光告诉记者,“与其他地方的文物不同,与圆明园有关文物如今往往都带有些许民族情感在里面。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增强,海外的圆明园文

做好追讨文物的‘准备活动’

■本报记者 王俊宁

不同于文物回归“缘分”的“虚无”,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总干事牛宪锋最近正在做一件“抓得住”的事情——完善流失文物缺失的信息。

这是一件“摸清家底”的工作,也是一件为流失文物回归提供准确依据的工作。

“所谓‘摸清家底’,就是要对流失文物的原址、传承、现状等信息都有一个全面、清楚的掌握。目前收藏在很多国外博物馆的流失文物,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其文物本身和原址在历史上都遭到破坏,现在人们在原址和国外博物馆里看到的都是残缺不全的。”牛宪锋说,“要证明一件文物确实是从中国流失的,就要追溯文物的历史轨迹和文化价值,让人们知道其原貌是怎样的、价值何在。”

“由于文物本身的缺失,特别是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流失,已经对文物的完整性造成破坏,考证数据也非常需要对方提供。”牛宪锋坦承这项工作的难处,“看不到实物只能依据手上掌握的情况做一些数据考究和文物简单复原,但是这些复原‘文物’往往都存在细节的不准确和有效信息的缺失。”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总监、首都博物馆前馆长韩永告诉记者:“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如今涉及到海外非法流失的文物,特别是与‘圆明园’‘敦煌莫高窟’等等受辱时期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往往容易引发民族情绪。而其实比呼号呐喊更为重要的是对流失文物的求证,是对求证事实太过缺乏的补充。”

做文物资料的考究实际上是为了在依法追讨非法流失文物时提供有效凭证。“现代文明社会的国家对艺术品的走私是有严格的法律惩治和约束的。”韩永指出,“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本国来历不明文物基本都会收缴之后再做处置,这也是文物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所在。特别是针对建国后通过走私途径流失在海外的文物,考究工作可以为依法追讨提供便利。”

韩永表示:“所以目前国内要做的是,政府层面要完善与流失文物回归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做到与国际接轨,利用国家公约对流失文物索回提供便利。另外,民间力量成为流失文物回归的主力,要重点培养文物的考究研究队伍,将每件文物都登记在案,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有据可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用“区别对待,择机而动”来看待海外非法流失文物。他表示:“要将眼光放长远,用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早已不是被动挨打的处境,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也在各个方面融入世界和引领世界发展。文物的价值不仅仅是物品本身,更多的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所以现在的海外文物追索,更要结合当下的社会背景来做,社会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对流失文物的态度也是如此,应该用正当的途径依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

物也更能引起人们关注。”

作为一段历史,圆明园是中华民族屈辱史的见证者,圆明园的文物也成为当年祖国惨遭凌辱的“证据”。去年4月26日,法国皮诺家族向中国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历时4年多曾首回归的坎坷之路也告一段落。

2008年秋天,曾参与圆明园猪首铜像回购运作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发布消息,世界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将于2009年2月23日至25日在法国巴黎拍卖中国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铜像。

消息一出,便引发了中国民众的热议。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猪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让事件进一步升温。而那次也是我国外交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

两件兽首回归始末的参与者,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总干事牛宪锋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表示:“无论是当时国内律师团的诉讼,还是政府对于事件的表态,甚至后来收藏家蔡铭超的‘流拍’等等,这些都说明面对那段历史中国人所坚持的态度和立场。”

“流失”这个词太含糊

然而与兽首的回归相比,此次石柱的回归还有不同之处。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流失文物’的定义。”牛宪锋告诉记者,“按照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的界定,所谓流失文物,就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年间,因战争劫掠、不平等交易以及盗掘、盗凿等不道德的和非法律途径而流失海外的文物。”

牛宪锋指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就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往来,而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以及私人收藏中的藏品,很多都是正当贸易方式输出的。此外还有一些是通过文化交流、礼尚往来等流传到国外。“所以说到文物回归,首先要明确的是针对非法途径流失到海外的。”

与牛宪锋持相同意见的,还有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总监、首都博物馆前馆长韩永。“‘流失’是一个很含糊的词语,不能准确表达回归文物的特征。”韩永说,“追索文物的对象是国外非法所得的中国文物,即如何流落外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

韩永补充说,文物流散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正常的贸易往来,清末政权更迭时期,逃离官员的携带、八旗子弟为改善生活的变卖等等都会使一些珍贵物品流落到海外。

宋向光也解释道:“认定一件文物属于流失文物,首先要做的就是考证。考证的过程就是要确认对方文物的获得是否经过合法的程序,如果是非法途径获得,这时候就要依靠相关证据和法律追索。”

回归靠“缘分”?

认定一件物品是非法流失文物之后,如何

促成文物的回归呢?

目前,非法流失的文物回归主要有回购、回赠和追讨三种形式。“追讨当然是最理想的方式,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也一直强调‘不可移动文物’的原则,表明向收藏这些流失文物的国外博物馆和收藏机构进行正式讨还的坚定立场。”牛宪锋告诉记者,“近年来国际上虽然陆续出台了一些公约,但是由于公约的溯及力和执行力的有限,非法流失的文物并没有因此而回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追讨文物流失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直接法律依据。现有的关于文物返还方面的国际公约有两个: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虽然它们都要求缔约国返还来自另一缔约国的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但两个公约均无溯及力,无法对公约在缔约国生效前的行为进行规制,不能成为中国追索历史上流失出去的文物的直接依据。”

王云霞还指出,根据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来提起诉讼也不太可行,因为历史上流失的文物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此外,宋向光也说道:“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博物馆藏有的文物大多都是国家公共性的社会资产,不属于博物馆所有,博物馆只是拥有保存和展出的权利,藏品的所有权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方——国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藏有中国流失文物的国外博物馆、艺术馆等,也没有返还文物的权利,还需要通过理事会、议会甚至国家法律的认可,难度可以想见。”

“有时候即使海外藏品馆想归还,因为本国法律的限制也无能为力。”牛宪锋有些无奈,“所以,一般在国外的博物馆、艺术馆等地方保存的文物,基本回归无望。我有时候会说,能不能回得来,也要看‘缘分’,因为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

他们眼中的“文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

“文物”一词在民国的时候称为“古物”,在国外称为“文化遗产”或者“文化财产”,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民经济的匮乏,对“古物”的保护也是有选择的。在一般的“古物”中选取有代表性、重要性的便称之为“文物”。抛开物件本身,文物更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的。

判断一个文物的价值要把物品、知识和艺术审美联系起来,并且要把文物本身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虑。比如说圆明园的文物本身或许并没有多珍贵,但是因为其本身承载的历史意义,所以才更有价值。

详细考究 依法追讨

追讨机会渺茫,那“回购”是否可行?

“购买海外流失文物会刺激国际文物市场上中国文物的价格,给中国现有文物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王云霞告诉记者,“同时,购买也会对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索非法转移文物造成很大阻碍。”

国家文物局明确声明,反对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购买流失文物,尤其是参与流失文物的竞拍。在中国政府与美国等国签署的关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双边协定(包括谅解备忘录)中,国有单位也被禁止在海外收购非法流转的中国文物。

“国家确实不应该出钱购买流失文物。”韩永也说道。

王云霞补充说:“中国政府仍可利用有关文物返还的道德原则,通过外交磋商等途径要求返还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中国流失文物,民间组织也可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促成特定文物的返还。”

作为中国政府从境外成功追回古墓被盗文物,2001年王处直墓武士浮雕的回归最具代表性。1994年6月下旬,河北保定曲阳县王处直墓被盗,墓室内大部分随葬品和壁龛内的绝大部分浮雕被洗劫一空。事后河北警方虽然抓获了盗墓团伙,但一部分文物已经被倒卖到海外。

2000年2月23日,河北省文物局获知佳士得拍卖行于3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品209号极有可能是王处直墓被盗的武士浮雕。随后国家文物局便针对此事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希望根据国际公约,阻止对209号拍品的拍卖,并使文物归还中国。

对方知道后,要求中方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证据。这样包括古墓被盗的录像带、现场勘察记录、照片、立案报告和有关墓葬情况的文字材料,专家说明、考古发掘报告等提供给对方。最后美国司法部作出判决,将文物无偿还给中国。

“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能够依法追回,就是在充分考证工作的基础上,依法追讨的结果。”牛宪锋说道。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总干事牛宪锋:

一定程度上说,让回归意义最重要的不是文物本身是否存在于中国,而是价值的回归:发挥文物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总监、首都博物馆前馆长韩永:

文物保护的诉求是为了社会和社会发展,其本质是为了“人”本身。文物回归的终极目的不是保护,而是利用。就是要通过文物的内涵,改变现在“以物代人,以保代用”的现状,审视现代社会的文化流变,从而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伦诺克)

文化微议

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抗抗表示今年还要继续呼吁解决稿酬个税起征点问题,她说:“具体数字我不建议,但起码要和城市月收入3500元的起征点持平吧。”从1980年起至今,稿酬个税起征点一直是800元。

在张抗抗委员看来,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小则关乎对智力劳动的尊重,大则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创作软环境。

张抗抗委员还表示:“一个作家写作,无论长短,怎么可以按月工资结算呢?至少应该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尊重个性、尊重原创,我想这是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前提。”

点评:稿酬个税改革的势在必行。不仅起征点要提高,是不是还应该根据情况分开计算,如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撰写一部小说或者著作、翻译等不同稿酬以不同方式征税。

政协委员称《水浒传》太暴力应禁播

日前,政协委员李海滨表示《水浒传》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传》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的时代不适应。此言论引发极大反响,网友纷纷围观。

有网友认同:“目前我们的电视早已偏向历史变得商业化,为了收视率单纯的打打杀杀太过血腥,是对历史的一种背离。”

反对的网友直言不讳:“四大名著是你想禁就禁得了的吗?之所以能成为国粹也有它的道理的,是永不过时的名著。”还有网友表示很无奈:“没文化太可怕了,那《西游记》也不要播了,太暴力,《红楼梦》也不播了,太色情。”

点评:电视剧热播,相关的书是不是也要禁读?再问,有几部世界经典名著与当下时代相适应?是不是都不要读了?李委员的话打击面太大,应当指出哪个版本的《水浒传》,哪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有问题,这样,才能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



电视剧《水浒传》剧照

20位委员建议阅读调查

两会期间,20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在全国省(区、市)开展全民阅读状况调查评价工作。

这份联名提案的第一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介绍说,近年来一些省市已开展城市全民阅读状况调查,有效促进了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

“然而,据我们所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状况调查评价工作的地区还非常少。目前全民阅读活动常常限于开展一些宣传、交流、捐赠图书等活动,不利于把全民阅读活动持续有效地开展下去。”聂震宁认为,切实开展好各地全民阅读调查评价工作,对于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记录全民阅读状况的发展变化,更好地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点评:这样的调查自然很有必要。通过调查,或许可以改善阅读的硬件设施。不过要想改变国内的阅读氛围及老百姓的阅读质量,这恐怕不是调查后能解决的。

国家非遗法成一纸空文

“我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很多法律和规定,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很好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在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委员看来,近年来,在国家层面,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然而,在具体落实和执行中却走了样。”冯骥才委员反问道:非遗法公布3年多了,谁见过媒体公布过一例执行非遗法的案例?

冯骥才委员呼吁:“中央要有决心,没有人落实是不行的。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前最重要的是抓落实。同时,为推动落实,应尽快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点评:列入非遗名单的高且保护不力,更不用说其他的了。所以只有纸面、口头上的保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落实以及从地方政府到普通百姓观念上的改变。

慕田峪长城将增两处涂鸦区

为减少长城所受的涂鸦破坏,怀柔区慕田峪长城景区将在5号和10号敌楼增设约10平方米的涂鸦专区,变“堵”为“疏”。

“既然有游客喜欢涂鸦,那就把它当作一个‘景观’来开发,专门设立‘涂鸦区’,不仅可以减少许多刮擦修整的烦恼,还满足了游客愿望。”慕田峪长城景区负责人介绍,一年多前慕田峪长城在14号敌楼西侧北铺房设立了一个涂鸦专区,此后在城墙上涂鸦的现象明显减少,但景区开放段长达3000米,不是所有游客都会走到14号敌楼,只设一个涂鸦区无法满足游客需求。

点评:咖啡馆里的涂鸦可满足小资情调,废墟墙上涂鸦是艺术家的表达,景点里的签名、“到此一游”就只能是破坏文物,把景点的乱涂乱画集中到一处,若干年后或许也能成为文物及文化的一部分。呵呵,有这个作用也不错。



长城被乱涂乱画

首届创意世界菁英论坛在京举行

器集聚与创新推动力”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每年都会主编一本《中国文化企业报告》,对前一年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总体分析,探索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竞争特点。而在当天的论坛上,陈少峰就提前分享了新一年的《中国文化企业报告》的部分内容。陈少峰预测,在中国文化产业“平台为王”的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将借由互联网平台移动化和无边界的特性,在未来的文化产业格局中独领风骚。

而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谢思全则讲述了天津和台湾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进行交流合作的曲折过程。谢思全认为,天津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三个优势,分别是经济基础雄厚、城市底蕴深厚和人力资源

丰厚。但同时也有三个劣势,谢思全将其总结为“三无”,即无标志性园区、无标志性事件、无标志性人物。她认为:“加强两岸文创产业的合作,现在是最好的合作时机。”

谢思全还介绍了她去台湾考察期间看到的文化创意产业案例。比如在西门町,街道上都是创意市集的店铺,内部全是由青年的创意人员进行的创意设计,并进行创意品牌的展销。谢思全直言:“考察了台湾才体会到文创产业该如何发展。”

在当天的论坛上,“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区联盟”(筹委会)也正式成立,旨在搭建起政府、园区、企业和媒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发挥出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创新作用、引领作用、转化作用和驱动作用。(张文静)